

绪论

——我的民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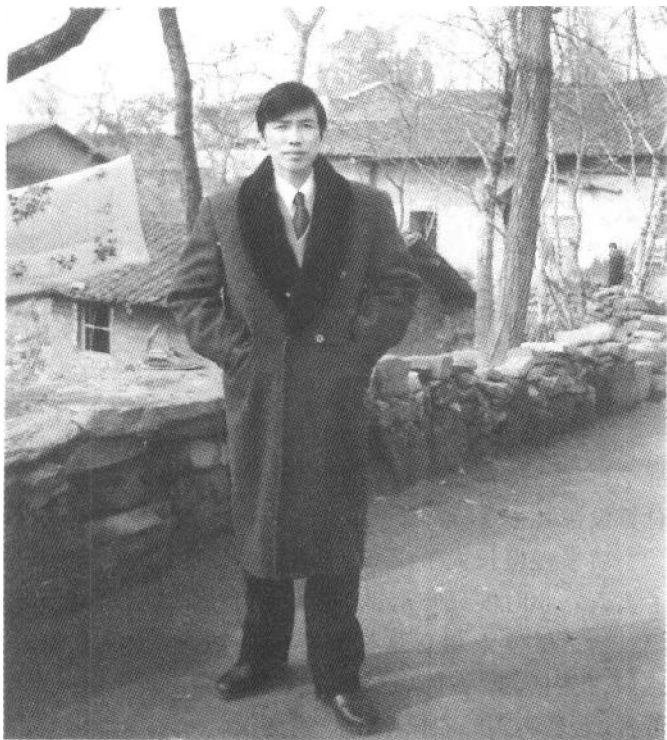
—

小时候，我是个农民。虽然生在新社会，但什么苦头都吃过，吃过野菜，吃过糠粃，甚至吃过树皮。只是命大，总算没饿死。

后来慢慢长大了，尽管长期营养不良，但终究也长成了大人。小时候只知道饿，长大了，除了饿以外，更知道想。脑子里整天想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停过。比如，我们这里为什么这么穷，怎样才能让村里那些辛辛苦苦、老老实实的农民吃上一顿饱饭。

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经济学，也没想过要学什么经济学。但命运偏偏让我干上了这个我原本一无所知的东西。从 1979 年我发表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算起，至今已经 20 年。在这 20 年的经济学生涯中，小时候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似乎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荡。只不过，那时候想的是我们村子为什么那么穷，后来想的是我们国家为什么那么穷；那时候想的是村里人怎样才能吃上一顿饱饭，后来想的是中国人怎样才能富起来。

1995 年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几个人的文集，



1998 年春节，作者在家乡。

其中也有我的。在这本文集（即《钟朋荣集》）的自序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勤劳的中国人民快快富起来。我看到温州等地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都富起来了，都盖上了楼房，打心眼里高兴，总想着如果中国人民都这样就好了。我研究经济一直把这作为最高出发点。”

这段话的确是我研究经济问题的最高追求，也是我

20 年来始终没有改变的追求。我经常在想，我的这种民富思想似乎不是学经济学学出来的，似乎在我学经济学以前就有了 产生在儿时 萌芽于对那些辛辛苦苦而又经常挨饿的村民们的理解与同情。

二

很早的时候，我就听到大队书记在开会时对我们讲：“大河无水小河干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我们很长时期内处理国与民、大与小的关系时所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

这话的基本意思是，每个人、每个单位都不要考虑小河，都要考虑大河。大家都如此，国家就富了；国家富了，人民自然也就富了。也就是说，富民要先富国，国富民自富。

国富和民富既是统一的，但有时又是矛盾的。说它统一，是因为国富是为了民富。国家富强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大大改善了。比如，大型电站多了，高速公路多了，国有厂矿企业多了，人们要致富也就比较容易了。说它矛盾，是因为有时国富不一定为了民富。例如美国，那么多的军费开支，在世界许多地方发动战争，有时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一定是为了美国人民富裕。又如，我们在 70 年代经济那么困难，人们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收成大都交给了国家，而国家将人们的血汗或者大把大把地送给了某些小国家，或者大把大把地埋进了山沟。

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首先要考虑哪个先富

更有利于二者同富。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下，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一个很小的国家，在一个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富与民富的统一性可能更强一些。在这样的国家，大河与每一条小河的距离都不会遥远，大家齐心协力将大河灌满后，大河很快就会把所有的小河带满。在我国，由于国家较大，各地的情况差异又比较大，每一条小河都感到与大河距离遥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始终将“大河”作为每个人、每个小单位、小团体的奋斗目标，许多人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高。结果，不但小河里没有水，大河里的水也很难满，甚至永远也满不了。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比较强调国富而比较忽视民富，结果，民没富国也没富。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不重视民富到重视民富。在农村，这一变化表现在由过去的征过头粮变为“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是自己的”。而国家征购是长期不变的，农民增产增收的部分基本上全部留给了自己。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增量部分全部留己。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和创收的积极性。在企业，过去是统收统支，企业不仅利润全部上交，连折旧也全部上交，弄得企业都没有积极性，工人都没有积极性。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让利经过了几个阶段，先是利润留成，后是利改税，再后是承包制。所有这些办法，都是让那些多收的企业可以多留，可以多分，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由统（农村口粮以外的粮食由国家统购，企业的利润由国家统收）变为统留结合。人们

不是冲着统的那一块使劲，而是冲着留的那一块使劲。但要多留就得增加总量，就得把整个蛋糕做大；而总量增加了，整个蛋糕都做大了，不仅留的多了，向国家交的自然而然地也多了。也就是说，民富了，国家自然而然也富了。这就是 20 年改革实践中所包含的民富国自富的道理，也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道理。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着大河，都是为了小河的水满而拼命劳动，拼命地经营，但大家努力的结果，不仅小河都满了，大河跟着满了。如果一开始就让大家为大河水满而努力，大家都会感到大河与己无关而不努力，结果大河始终也满不了。

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快 50 年了。这 50 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 30 年民穷后 20 年民富。当然，穷和富都是相对概念。中国人与美国人、日本人比，仍然算穷的。但毕竟那么多人都住上了楼房，都买了彩电、冰箱甚至汽车，至少绝大多数人吃饭已经不成问题，自己与自己以前比，应该算是相当富了。前 30 年，那可是真穷，穷得多数人都饿肚皮，甚至饿死了上千万人。我曾与四川一位名叫林善斌的朋友（56 岁，四川华西农业集团老总）交谈，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村里饿死不少人，没有饿死的人也没劲，所以许多尸体很久都没人埋。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三年自然灾害所致。但三年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今天，能饿死人吗？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人祸又来自何方？来自一个“草论”。驳乱反正时期，我们都在批判张春桥的一句名言，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的确出自张春桥之口，但这种思想却不是张春桥一个人的脑袋里有，应该说，这是前 30 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从事任何经济工作，首先要考虑生产关系是否一大二公；至于生产力，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在农村，关键是要坚持人民公社，甚至还要吃大食堂。不仅生产资料高度的公有，生产活动高度的集中，就连消费资料也要高度的公有，消费活动也要高度的集中。至于按照这一套运作，农民是否有积极性，地里是否长庄稼，老百姓是否有饭吃，那都是次要问题。我记得当地的一位领导干部在大会上这么讲：“搞人民公社，粮食暂时减产了点算什么，收不到粮食收稻草，收不到稻草收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千变化万变化，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由“草论”转向了“猫论”。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内容很丰富，但是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最大的就是“猫论”，对我国人民思想更新所起作用最大的也是“猫论”。

前 30 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后 20 年是“不管白猫黑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近 50 年来中国人穷与富的根源。

“草论”与“猫论”的分歧 用经济学语言翻译 就是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分歧。也就是说，在经济工作中是坚持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至上，还是坚持生产力至上。所谓“草论”，就是在经济工作中坚

持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至上；所谓“猫论”就是在经济工作中坚持生产力至上。有一句流行歌词这么唱：“为了生活 人们四处奔波。”在我国前 30 年的经济工作中，中国人民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所有制而四处奔波。奔波了几十年，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许多人才逐渐明白，原来所有制不能当饭吃，中国人只能吃饭而不能吃所有制。于是才有了驳乱反正，才有了实践标准代替“两个凡是”才有了“猫论”代替“草论”。

坚持“猫论”坚持生产力至上 就是坚持人民的利益至上，或者说，坚持民富至上。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什么生产关系、什么所有制都是第二位的，吃饭才是第一位的。一种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所有制，却让人们长期挨饿，甚至被活活地饿死，这种所有制对他们有什么用。反过来，一种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所有制，不仅能让人们吃饱饭，还能让他们日子越过越美好，那种所有制为什么不用？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把它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就是不管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能让广大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好所有制。

“猫论”的核心 就是以人为本 把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把他们的致富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都是人民致富的手段。就像农民种地用的锄头和拖拉机，哪种东西能让他多产粮食、吃饱饭，就用哪种东西；哪种东西不能让他多产粮食、吃饱饭，就把它换掉。而“草论”的核心 就是以生产关系为本 以所有制为本，甚至以某些人脑子里固有的观念为本位，至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有饭吃，是否吃得饱，那都是次要问题。在他们看来 只要能坚持“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即使饿死

了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温州人因地少人多而四处要饭，甚至饿死不少人，坚持“草论”，坚持所有制本位论的人们心安理得、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通过自己没日没夜地干，好不容易吃了几顿饱饭，好不容易盖起了几栋小楼，他们就坐立不安，似乎天要塌下来，整天地批，整天地查。原因就在于温州人发展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工业，而私有制是方向性的问题，是比饿死几千万人要严重一万倍的方向性的问题。

四

民富来自民勤。中国是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仅仅靠卖资源致富，也不可能靠外援致富，更不可能靠战争或掠夺致富，中国人要致富，只能靠大家的勤劳和创造。

我出生在一个比“贫下中农”还要贫下中农的家庭。祖父钟显成，长期在鄂州市一个农村为地主当长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家乡。据他说，他一辈子很少坐下来吃饭，一般是从地里回来就吃，吃完了马上又下地干活，几十年一直如此。再说我外祖父，他也是一辈子给地主当长工，而且一直住地主家。我妈妈和两个舅舅都在地主家长大。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经常听到祖父和外祖父说这样的话：“人只要勤劳 不会没饭吃。”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吃了几十年的大锅饭，把许多人都吃懒了。前几年有句民谣说：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当前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情性较强的现状。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要让一部分人先勤劳起来。

为此，对那些勤劳的人，我们要百般地爱护他们的劳动热情。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只有勤劳起来，才能富起来；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有更多的人都勤劳起来，国家的富强才有希望。我到温州，看到那些像蚂蚁一样为创造财富而忙碌的人，感到由衷的敬佩。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温州人的精神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我认为，温州人这种勤劳的本质，应该成为整个中国国民的楷模。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勤劳人有时得不到奖赏，甚至得不到保护。当他们想创造财富的时候，不是处处得到支持，而是经常遭到刁难，甚至受到打击。我国政府的机构膨胀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机构膨胀导致公章膨胀，人们办芝麻大的事，有时甚至要盖几百个公章。结果，庞大的机构不是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方便，而是让那些创造财富的人举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一些人自己不创造财富，让别人也创造不了财富。政府的腐败和低效，是对人民创造热情的致命打击。

社会治安状况较差，是打击勤劳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我到一些地方调查，农民反映他们那里水库里没有鱼。我问为什么不养鱼，他们说强盗太多，我们白天养，他们

晚上偷，干脆就不养了。可见，社会治安差确实是对勤劳人的打击。勤劳人与懒惰者相比，一般要富有有一些，结果成了盗匪袭击的目标。有的人白天辛勤劳动，晚上提心吊胆。久而久之，他也会想通的，何必那么勤劳，还不如自己也加入盗匪的行列。所以，一个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保护勤劳、鼓励勤劳的重要条件。



1998年3月23日的《中国企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作者的《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一文，并加了以下按语：“中国的富强需要全国人民拼命地创造和积累。如何在10多亿中国人中形成拼命创造财富和自觉积累财富的机制？经济学家钟朋荣最近提出独家观点。”

五

在一般情况下，勤劳者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在勤劳者当中，又有节俭和奢侈之分。奢侈者赚钱不存钱，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潇洒，但没有财产积累。勤劳而节俭者是这个社会最想不开的人，他们一方面拼命挣钱，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花钱，结果大量的劳动收入转化成了财富积累。

这样，整个社会就出现了 3 种结果：因懒惰而贫困者，因勤劳但奢侈而无产者，因勤劳且节俭而有产者。

以上 3 种人是比较一般的情况。除这 3 种情况外，还有几种特殊的情况，使一些人勤而不富，另一些人富而不勤。一是有些人虽然很勤奋，但因劳动能力太差，仍然落入了贫困者行列；二是因就业机会或创业机会少，有些本来很勤奋的人，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失业在家；三是有些人因机遇，包括市场机遇、政策机遇等等，不好，事业失败而贫困；四是有些人并不那么勤奋，因天赐良机而发财；五是少数人以权致富或非法致富。这些特殊情况在全部人群中不占主流，本书其他章节有所论述，这里暂且不论。

勤劳使一部分人富有，节俭的富有者又成了有产者。于是，如何对待有产者就成了如何对待民富的一个焦点。

关于财产，我们以前只是从所有权上进行划分，即将其划分为公有和私有。公有制好、私有制坏的观念，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其实，仅仅从所有权上观察财产

并不全面，我们还应当从财产的实际使用上进行划分。公有财产不见得都是公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用；私有财产也并非都是私用，私有财产在所有者消费之外的部分，名义上归他个人所有，客观上为社会所用，包括为社会提供就业，为社会创造使用价值，为国家提供税收。因此，整个社会的财产应该分为 4 块，即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不是公有财产越多越好，而是公用财产越多越好。

人们辛辛苦苦地创办企业，起初都是为了一个比较自私的目的，即养家糊口，发财致富。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有以下因素使财富创造者和积累者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异化：

一是随着企业的创办、生存问题，甚至“小康问题”早已解决。企业的扩大，资产的扩张，利润的增加，已经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享受，而是为了成就一种事业，或者是为了满足一种个人追求。这时，无论人们从事何种事业，都是为 8 个字而奋斗，即“实现自我，奉献社会”。主观上是实现了自我，客观上奉献了社会。只不过，不同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不一样，奉献社会的内容也不一样。有产者以更多的财产积累实现自我，他们向社会奉献的是个人财产；经济学家则是以更有价值的理论和著作实现自我，他们向社会奉献的是经济学思想。

以上是产生异化的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每个创办企业的人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金投入企业的循环之中。企业资产多少算大？1000 万元？身边还有 1 亿元的；10 亿元？身边

还有 100 亿元的。大鱼吃小鱼，这是市场竞争的规律。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拼命地做大。竞争的压力和做大的动力，使那些有产者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贪图享受，不得不一心扑在事业上。

荣誉感则是产生上述异化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当人们把企业办到一定的规模，财产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已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享受而办企业。这时，与其说是图利，不如说是图名。100 亿元、10 亿元与 1 亿元的区别是首富，十大富翁之一与十大富翁之外的区别，是当政协常委、政协委员和进不了政协的区别，绝不是花钱多少和享乐高低的区别。这时，积累财富与其说是为利，不如说是为名。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促使那些勤劳而节俭的人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积累财富，但又很少消耗财富。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被积累起来，名义上归他私人所有，实际上为社会公用。这种财富对其所有者来说，与其说是权力或利益，不如说是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10 亿元意味着要赚回 1 亿元；100 亿元意味着要赚回 10 亿元。不赚回这些，资产回报率达不到 10%，他有可能吃不好、睡不香。这种激励人们拼命创造和积累财富而又很少消耗财富的社会机制，我把它称为私有公用制。正是这种私有公用制，推动着财富的增加，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六

因此，我们的社会舆论，包括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和文艺作品，都有一个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有产者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中国富人的问题。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 4 句话：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企业利润以及整个资本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工人起来将资产分掉是物归原主。

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是把人写得富而坏、贫而良。一位漂亮的小姐，嫁给富家子弟，下场悲惨。经过几番挣扎，终于逃脱虎口，回到了他的恋人——穷家子弟的怀抱，剧情由悲而喜。这是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共同的情节。

在我国一部分人的观念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杀富济贫”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这些人有个很奇怪的心态 外商来了 毕恭毕敬 把最优惠的政策给他 把最好的土地给他；而自己的同胞发了财，特别是在本乡本土发了财，他们就另眼相看，恨不得合起伙来把他掐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一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常常这么说：你要勤劳，不要懒惰。子女听了父母的话，通过勤劳赚了不少钱，父母又说：你要节俭，把这些钱用于创办事业，不要都挥霍掉了。子女又听了父母的话，把钱用来办工厂、办商店。事业越办越大，雇工也就越来越多。按照上述理论和观念，他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成了“杀富济贫”的对象。那么 这些父

母是否把他们的子女往邪路上引呢？

因此，鼓励民富，要有一个正确的舆论环境。我们经常讲舆论导向。对 12 亿中国人来说，最大的舆论导向就是在勤劳与懒惰之间，是导向勤劳还是导向懒惰？在节俭与奢侈之间，是导向节俭还是导向奢侈？之所以说这是最大的舆论导向，因为它关系到把我们的国家导向何处，是导向贫困还是导向富强？关系到把我们的国民导向何处，是导向艰苦奋斗，还是导向懒惰奢侈？

中国现在不是有产者多了，而是有产者少了。这个国家需要更多、更大的有产者。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数以亿计的失业人口；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才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社会稳定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理论要面对现实，我们的作家要转变观念，我们的社会舆论要鼓励而不是打击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我们的作品要多塑造一些像阿信那样的人物，多写一些像《爱拼才会赢》那样的歌曲，去鼓励那些勤劳和节俭的人们，去歌颂那些为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有功之臣。

七

财富需要更多的人去创造。而人们是否创造财富，有多少人创造财富，他们以什么样的热情去创造财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

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总收入，而是来自于税后净收入。同样多的总收入，税收越高，税后的净收入就越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就越小；税收越低，税后的净收入就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就越大。

国家不可能没有税收，但国家税收的多少，税率的高低，却有很大的弹性。这里，关键是整个社会的资金谁来分、谁来用的问题。即更多的是由财政分、政府用，还是更多的由市场分、企业用？作出这种选择，有 3 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即一是融资成本；二是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是否有利于调动资金创造者的积极性。

征税成本高是显而易见的，而国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所收上来的钱——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再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层层分下去，分配过程就是一个来回的公关过程。为了要这笔钱，大家跑北京、上省城，所花费的资金总起来甚至超过所分配的资金。这种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的资金，要去后的使用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财政集中那么多钱财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建某个项目吗？比如，建一条高速公路，建一个电站等等。把老百姓的钱收上来，再通过拨款建这些项目是一种办法；将老百姓的钱少收一些，然后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让老百姓直接向这些项目投资，这也是一种办法。

比较这两种办法，后一种办法不仅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积累更多建设资金的积极性。因为采取这种办法的直接效果是税率大大降低。随着税率的降低，人们进一步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会大为增强。

在这里，我们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认为放在老百姓那

里的都是私人的钱，只有收上来，收到国家财政那里，才是社会的。其实，国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了消费，而是买了那些公路、电站之类项目的股票或债券。结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个虚拟的东西，只是一张纸，真正的财产是公路，是大型项目。这样，国家该上的项目并没有因减税而影响，但就因为老百姓家中多了一张纸——股票或债券，这张纸成了他进一步创造财富的巨大的动力源泉，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家的财产因全家人的勤劳和节俭而增加。老百姓作为这些项目的股东或债权人，他会从这些项目的盈利中分红或派息，但这些红利一般又会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他们家里只是又增加了一张新纸。结果，整个社会的项目越来越多；每个家庭所持有的纸——债券或股票越来越多，在这些纸的推动下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有增无减，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

八

通过“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通过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一系列舆论环境，消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后顾之忧；通过高效、廉洁的政府建设，扫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行政障碍；通过尽可能低的税收政策，增强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动力；通过对各种社会犯罪的严厉惩处，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增加财富创造和积累者的安全感。所有这些，会使那些愿意创造财富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软环境，他们创造和积累财富